

目 录

上编：生平及文学活动

第一章	吾家旧有簪缨·····	(3)
第二章	宣传京国声价·····	(9)
第三章	憔悴江南倦客·····	(21)
第四章	前度刘郎重到·····	(32)
第五章	事逐孤鸿尽去·····	(51)

下编：清真词专论

第六章	失意士人多怨歌·····	(65)
第七章	羁旅哀吟动人心·····	(73)
第八章	恋词深挚语皆真·····	(81)
第九章	技新法密穷变化·····	(93)
第十章	语不惊人死不休·····	(112)
第十一章	词林冠冕诂容诬·····	(122)
第十二章	钱塘千载衍流长·····	(138)

上 编

生平及文学活动

第一章 吾家旧有簪缨

19世纪法国美学家丹纳在他的名著《艺术哲学》第一章《艺术品的本质》中论述道：

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

同书中丹纳又说：

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广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家族。例如莎士比亚，初看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迹，从别个星球上来的陨石，但在他的周围，我们发现十来个优秀的剧作家，……在画家方面，卢本斯好像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前无师承，后无来者。但只要到比利时去参观根特、布鲁塞尔、尔鲁日、盎凡尔斯各地的教堂，就发觉有整批的画家才具都和卢本斯相仿……到了今日，他们同时代的大宗师的荣名似乎把他们湮没了；但要了解那位大师，仍然需要把这些有才能的作家集中

在他周围，因为他只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只是这个艺术家庭中最显赫的一个代表。

周邦彦，这位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作为北宋晚期词坛上“最高的一根枝条”，也有其赖以出生成长的特定时代、特殊环境和一个给予他深远影响的“家族”。

周邦彦的故乡杭州，是一个誉满中外的美丽城市。杭州的盛名并不自宋代始。早在汉魏隋唐之世，这个风景名胜的经济、文化已经很发达了。宋朝，是这座古城在历史上的全盛时期。南宋朝廷在杭州建都，不用说促成了这个城市空前的繁荣富丽。但还在北宋时，这里就因经济文化繁荣而又兼有湖山之胜，被称为“东南第一州”了。五代十国之时它曾是吴越国都。赵匡胤代后周而立，建立宋朝，这标志着五代十国分裂动乱局面的结束。公元978年，吴越王钱俶迫于全国重归一统的大势，献土降宋，于是杭州重新归到中央政权的统辖之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培植经营，到了宋仁宗统治的中期，杭州的美丽富饶已经十分惊人。当时，这片山奇水秀之地，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满城中绣幕风帘，烟柳画桥，书声朗朗，弦歌盈耳。再加上阳春桃李争妍，炎夏荷榴竞放，凉秋则桂子飘香，寒冬则梅花绽玉；四时佳景，更令人应接不暇。那位号称将宋仁宗在位42年的太平景象写尽的风流才子柳永，到杭州游览一番之后，被这里的种种繁华景象刺激得词技大痒，于是即兴挥毫，写下了著名的《望海潮》词：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

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
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
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
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
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从这首词的形象而生动的铺叙，我们大略可以窥见宋仁宗时期钱塘江的壮观、西子湖的清景、杭州城的繁华以及此地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奢。日益高涨的封建城市经济和不断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滋养了这一地区的文化人物，促成了这一地区文学艺术的发展。骚人墨客，不断从这个山水灵秀之城涌现。单在北宋前期，这个东南都会就向全国文坛输送了潘阆、钱惟演、钱易、林逋、元绛、强至、沈辽、沈括等名震当世的诗人、作家。就在柳永题写了上引那首《望海潮》以后一些时间，仁宗嘉祐元年（1056），周邦彦这位后来者诞生在杭州城一个诗礼仕宦之家。

这颗新星刚刚降落在周家，长辈就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为他取名邦彦，字美成，就是用《诗经·羔裘》：“彼其之子，邦之彦兮”，和晋代陆机诗：“邦彦应运兴，粲若春林葩”的含义，要让他成为国之佳士。这位西子湖畔的旧家子，当他长大成人之后，果然成为邦之名彦，以他文学创作的光辉照亮了北宋中后期的词坛。他有生之年声名赫赫，而身后又影响词坛达数百年之久，但对于他的家世，由于流传至今的有关历史资料太简略，我们已无法勾画出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不过从他中年漂泊在外时所写的《南浦》一词中“吾家旧有簪缨，甚顿作天涯，经岁羁旅”的自述来看，

他的祖上肯定不乏作过官摆过阔的人物。他家祖父以上的名讳宦迹已不可考。他的生父大约因为仕途不显而默默无闻，在史书和地方志上连一个名字也未能留下。在周邦彦的父辈中，作过显官、有过文名，并对他有过较大影响的，首推其叔父周邠。

周邠字开祖，在嘉祐八年（1063）即周邦彦八岁那年登进士第。他是当时著名文学家陈舜俞（苏轼之友，“湖州六客”之一）的女婿。周邠既是一位能干的官吏，又是一位有才华的诗人。他与苏轼相交甚深，友谊十分长久。神宗熙宁四年，周邦彦16岁时，苏轼来到杭州任通判之职。苏轼在任的三年期间，经常与周邠联袂出游，饮宴唱和。西湖边的有美堂上、灵隐寺中，常常回荡着他们的吟诗唱曲之声。苏轼的杭州诗作中多次提到的“周长官”就是这位周邠。可以想见，在这些频繁的交往唱酬中，作为侄儿的周邦彦虽未成年，但不可能不随侍其间，接受两位前辈的熏陶和教诲。以后苏轼自密州改除河中府，过潍州，周邠适为乐清县令，以《雁荡图》寄苏轼，并题诗为赠。苏轼有和韵诗回赠，诗中深情地回忆二人在杭州的友谊道：“西湖三载与君同”。以后苏轼知湖州，元丰二年，属于新党的舒亶、李定、何正臣等人摘出苏轼的一些不满王安石新法的诗句，深文周纳，加以弹劾，使苏轼被捕入狱。这就是震动朝野的“乌台诗案”。次年苏轼被开释，责授黄州团练副使。在此案中，无辜的周邠也被牵连，受到赎金的惩罚。

周邠名重于当时，不但为苏轼所推崇，而且与老词人张先、著名诗僧道潜（别号参寥子，浙江于潜人）等人也有交

游唱和^①。元丰四年，周邠知溧水县。旋又知管城县，以复管城为郑州的“兴废补败之功”，升为寿州通判。后知吉州，官至朝请大夫，上轻车都尉，前后历官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周邦彦对这位叔叔十分尊崇，他现存诗歌中还有称颂周邠的专章《艺术歌》等。由此可见周邠对邦彦影响之深。

邦彦还有一个哥哥叫邦式。邦式字南伯，早年就著名于杭州。与周邠一样，邦式也是一个为宦终生，并为乡里所推重的人物。他于神宗元丰二年考上进士，任开封府祥符县尉，转知封丘县，通判磁州、郢州，官至提点江东刑狱。后提举南京鸿庆宫12年，又起知处州，不赴，积官中大夫。享年75岁。邦式与邦彦弟兄二人晚年宦迹相似，都知处州，都提举南京鸿庆宫，这被近人王国维叹为“盛事”。

周邦彦在这样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官宦家族中出生和成长，从小受到家乡的煌煌文化和叔叔周邠、前辈苏轼及哥哥邦式等的教育或影响，所以他很早就“博涉百家之书”，打下了极为深厚的从事文学创作的基础。传世的三个周邦彦的传记：《宋史》本传、《东都事略》本传及《咸淳临安志·人物传》虽然对他的生平记载都极为简略，但却一致称颂他自幼“涉猎书史”，“博极百家之书”。看来，邦彦的刻苦攻读和博学多闻，的确是当时的人们公认的一个事实。

但是，奉儒守官的家庭教养和经史百家的熏染培育，并没有使周邦彦成长为一个恂恂的学究或庄严的道学家。相

①《永乐大典》卷八百九十九尚存张先七绝诗《酬周开祖示长调见李诗集》一首，《咸淳临安志》载参寥子《次韵周开祖大夫泛湖见访》七律一首。

反，他身上的文学家的气息十分浓厚。从他一生的为人行事看来，他是属于那种风流浪漫型的文人。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得到唐代诗人李义山、杜牧之、温飞卿和宋代词人柳永等的某些痕迹。大约还在居家的青年时期，他就有些洒落随便，不大遵从儒家的所谓“礼义”、“名教”，生活作风较为粗疏，不护细行。还可能有一些旧家子弟难免的风流韵事，不符合正统儒家子弟的做人标准。因而史传材料多责其“性落魄不羁”，“疏隽少检”，“风流自命”等等。这些当然不是我们今天衡量这位古人品行的依据。但在儒家名教纲常占统治地位的宋代，周邦彦却因此招致了不少麻烦（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几章里还将具体地辨析评论）。与他的父辈和兄长之名重于钱塘的情况截然相反，周邦彦一向“不为州里所推重”。从历史材料的这些闪烁其辞、语焉不详的记载里，我们可以推想到，青年周邦彦大约还受到家乡上层社会舆论的压抑和有势力的父老们的冷遇，日子是不怎么好过的。

钱塘虽然美丽，但毕竟只有一勺西湖水，远不够蛟龙搏击；钱塘虽然繁华，毕竟僻处东南一隅，不足以成为高才健足者驰骋的天地。诗书满腹的周邦彦不甘受压抑和冷遇，更不愿默默无闻地老死乡里，他在热切地寻求出路。

终于，一展骥足的机会出现了。

元丰二年，封建国家的最高学府——太学奉诏增太学生舍为 80 斋，每斋定员 30 人；外舍生 2000 人，内舍生 300 人，上舍生 100 人。年方 24 岁的周邦彦正好赶上这个“扩大招生”的机会，他以州县考试的良好成绩，被选拔为太学生。于是，他兴高采烈地辞别父母之邦，北渡长江，取道天长（今属安徽），迤逦向汴京进发。

第二章 喧传京国声价

年青的东南游子周邦彦初进汴京，对这个远比钱塘繁荣的花花世界感到新奇万分。恰如他后来在《汴都赋》中所追述的，自己来自“微邦陋邑，未睹乎雄藩大都”，“观土木之妙，冠盖之富，炜烨灿烂，心诚神悸，瞶瞶而不敢进，于是夷犹于通衢，彷徨不知所届。”这些心理描叙或许有些夸大。不过我们知道，宋朝从10世纪中期定都汴京到元丰年间已经120来年。其间这个封建皇朝虽然一直为内忧外患所困扰，但毕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繁荣稳定。统治集团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集中全国之力，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优先而且大规模地经营汴京，使这片中州胜地成了统治阶级最大的消费中心和文化乐园。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新法的实施更给本来就繁富的帝都锦上添花。士人举子，无不以到汴京一试手脚、求取功名为荣。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年少气锐的周邦彦踏进这块土地，正所谓“得其所哉”，他感到既惊且喜，这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周邦彦奔赴汴京，固然是要通过读书闯出路，但他也受到了封建帝都享乐生活的感染和召唤。每当他于太学读书之暇漫步在六街九衢，时时使他双目迷乱的，自然是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所渲染的如下一派景象：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

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这样的客观环境，深深地影响了周邦彦的日常生活和早期的文学创作。北宋曲子词的繁荣，本来就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与青楼瓦肆的大量涌现密不可分。当时各种“官妓”、“营妓”、“家妓”多善唱曲子，并以这种表演来满足中上层社会文化娱乐的需要。于是唱词成了风行的文艺样式。早在宋仁宗时期，汴京城里到处“歌台舞榭，竞睹新声”，社会对曲子词的大量需求，刺激了这个文艺新品种的发展。文人的雅集，官僚的饮宴，一定要歌妓助兴，词手们往往即席填词给她们演唱，这就是所谓“应歌之词”。这些应歌之词又大多以代歌妓言情为主，故“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比比皆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晏殊父子、张先、欧阳修、柳永、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人，无不填写了大量的此类应歌之词。稍晚一些步入汴京文坛的周邦彦，本来就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又精通音乐，有“顾曲周郎”的美誉。这样的主观条件一经与汴京的时尚遇合，于是他的早期文学活动自然以歌词创作为突破口，结出了第一批果实。这就是我们在现存清真词集中看到的那部分温柔狎昵、软媚浑成而又欢

快明朗的恋情词。他首旅汴京期间，常款洽于歌楼妓馆，在那些精通音乐的异性中去寻求知音，寻求在枯燥乏味的封建家庭生活中难找的青春遇合。他的某些早期词作，记下了这种生活经历的若干片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下面一首短调《少年游》：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①

小词记述的，无非是作者自己在秦楼楚馆的一次逗留。这在当时士大夫中本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是一种“时兴”题材，内容上毫无特殊之处。但此词之所以能得到历代论词家的一致推许，却是因为周邦彦这位白描高手具有惊人的描写工夫。他在这51字的小令中，竟能曲折深微、真切自然地将乐妓的心理状态在对话中毕现出来，连这类人特有的口吻也描摹得维妙维肖，大有呼之欲出之概。此词以警动胜，以洒脱明快胜，不假雕饰，色泽淡而意态浓。这些正是周邦彦早期词的特色。

由于小歌词的传播，周邦彦在汴京很快赢得了声誉。歌妓们特别喜欢演唱他写的词，这不仅因为他的词声调谐雅，宛转便歌，更为重要的是，他比较熟悉和了解她们，能够细

①本书据郑文焯《清真词校后录要》及龙沐勋《清真词叙论》定此词为初旅汴京之作。前人有谓此词为与徽宗争风吃醋之作，纯属编造，详后文辨析。

致入微地反映她们的生活，在词中真实生动地代言其悲欢离合之常情。这些出身低贱、受人玩弄的艺妓们的各种心思和苦衷，是那些只知狎侮异性的上层富豪所不屑一顾的。周邦彦却能真诚地代言其情，所以他能像秦观、柳永等那样赢得她们的欢爱与尊敬。试看他的另一首专为歌女写情的早期作品《意难忘》：

衣染莺黄，爱停歌驻拍，劝酒持觞。低鬟蝉影动，私语口脂香。檐露滴，竹风凉，拼剧饮淋浪。夜渐深，笼灯就月，子细端相。知音见说无双，解移宫换羽，未怕周郎。长擎知有恨，贪耍不成妆。些个事，恼人肠。试说与何妨？又恐伊，寻消问息，瘦损容光。

需要趁此说明的是，周邦彦的应歌赠妓之作中，既有相当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那个社会圈子里的生活和人物的好作品，也有少数篇章暴露了作者自己庸俗的一面。但有人却以偏概全，以为周邦彦的词大多是描写了作者自己的“眠花宿柳的无聊生活”，应该批判。这种看法缺乏具体分析，更没有顾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士大夫中的风气。事实上，当时的词家之所以在宴会上赠词于歌女、家妓，常常是奉主人之命，或是朋辈中竞相凑凑趣，并不能证明这些词的作者自己一定“眠花宿柳”。甚至在平康巷陌写词赠妓，也未必都留宿，如明清之后某些人专门花钱宿娼那样。主人之蓄养歌妓，有的也主要是赏其艺术，或备作宴客之用。如唐朝时，玄宗常召念奴唱歌，“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元稹《连昌宫词》）。可见当时歌女亦有相当自由。从周

邦彦现存词看，在写到异性的作品中，有纯属应酬、赞颂宴会主人的歌妓之美的；有写别人情事，与自己无涉的；也确有写自己经历的。而写自己经历的，也有写与异性“知音”的真诚交往和纯写狎妓过程的两种。这些要作具体分析。

还须指出的是，邦彦虽因填词而赢得了青楼歌星和教坊乐工的爱戴，但他并不见得都以此为荣。到晚年他甚而略显迂阔地回忆说：“某老矣，颇悔少作。”事实上他的“少作”也并非只有应歌赠妓之词，还有不少抒发个人多方面情感的优秀短章。比如他少年客居汴京，却时时深情地怀念家乡钱塘。在一个盛夏的清晨，他从思乡的甜梦中醒来，面对眼前的雨后景色，禁不住吟出了这样一首毫无脂粉气的小曲：

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
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故乡遥，何
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
轻舟，梦入芙蓉浦。

（《苏幕遮》）

上引这些小词，艺术水平够高的了。单凭这些词，年青的太学生周邦彦与北宋婉约派名家们并列已无愧色。但正如柳永以应歌赠妓之词闻名，使人们常常忘了他还有《煮海歌》等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诗篇一样，周邦彦以柔丽婉约之词驰名当时，也同样使人们误以为他只是一个风流才子，对小词之外无所关心。实际上小歌词并不是他创作的全部。从这些作品反映出的内容更不是他生活的全部。确切一些说，虽然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最高成就是词，但词却不是他

唯一的创作，甚至不是主要的创作。宋人多以诗文写作为主，而以词为诗余、小道，邦彦亦莫能外。度曲填词仅仅表明他跟随着士大夫中早已有之的时尚，或抒发了其人的某一方面的思想感情而已。太学里堆积如山的书卷并没有使他迂腐，灯红酒绿中的浅斟低唱也没有使他沉溺。这位年青的文学家时时在观察形势，留心政局，并不断用诗赋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尽管他的诗文绝大部分已经失传，但从幸存的一些零星篇章中我们仍可明显地感受到，周邦彦青年时期的文学创作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性。

他关注着国家边境的安全，并曾用一些长篇诗歌来反映了当时的西北战事。北宋王朝与西北边境的党项羌统治集团的武装冲突，自开国以来连绵不断。宋朝军队缺乏作战能力，不能有效地抵御对方的侵扰。尽管年年靠搜刮人民来向对方交纳数量巨大得惊人的银绢，还是无法解除军事威胁。元丰五年九月，西夏起倾国之兵（号称30万）围攻边境的永乐城。宋守军屡败，守将徐禧等愁困孤城，退路被阻绝。延州守将种谔怨恨徐禧，闹私人意气，竟不遣救兵。城中乏水多日，将士渴死者大半，至绞马粪汁而饮。城陷，宋师全军覆没，徐禧等遇害，只有副将王湛、曲珍等光着脚逃了出来。此役宋军共丧将校士卒民伕等凡20余万，西夏乘胜耀兵米脂城下而还。消息传到汴京，朝野震动极大。为此周邦彦特作《天赐白》诗一首，借曲珍（又作曲真）偶然得一匹白马生还之事，痛悼宋军之丧师辱国，惋惜真正有用的将才坐贬而无用武之地。诗并序云：

永乐城陷，独王湛、曲真夜缝以出。真持木为兵，

且走且敌，前陷大泽中，顾其旁有马而白，暂腾上驰去，五鼓达米脂城，因以得脱。真名其马为“天赐白”。蔡天启得其事于西人，邀予同赋。

君不见书生鏖羌勒兵入，羌来薄城束练急。蜡丸飞出辞大家，帐下健儿纷雨泣。凿沙到石终无水，扰扰万人如蝼蚁。挽絙窃出两将军，虏箭随来风掠耳。道旁神马白雪毛，噤口不嘶深夜逃。忽闻汉语米脂下，黑雾压城风怒号。脱身归来对刀笔，短衣射虎朝朝出。自惟杂宝涂箭创，心折骨惊如昨日。谷城鲁公天下雄，阴陵一跌兵力穷。舡舟不渡谢亭长，有何面目归江东？将军偶生名已弱，铁花暗涩龙文镞。缟帐肥甘酬马恩，闲望旄头向西落。

（诗出陈郁《藏一话腴》）

另一首题材相近的长篇七古《薛侯马》也作于太学时。此诗亦出于南宋陈郁《藏一话腴》，它为一位作战有功的西军将领薛某不得升调，困居京城的遭遇鸣不平。篇末热情歌颂边防将士的牺牲精神和爱国理想道：

边人视死亦寻常，笑里辞家登战场。铨劳定次屈壮士，两眼荧荧收泪光。齿坚食肉何曾老，骗马身轻飞一鸟。焉知不将万人行，横槊西风贺兰道。

试看这些诗中出现的是多么悲壮感人的事件，多么雄快豪放的风格！聆听着此中铁马金戈的鸣响，看到字里行间凸现出来的金刚怒目的勇士，直令人联想起唐代的边塞诗。正

如陈郁在引录原诗后所称赞的，这类有盛唐风的杰作，“岂区区学晚唐者可及耶？”谁说周邦彦只会用昵昵儿女语编织绮罗香泽的小词？这些七古长篇不正是笔走风雷的大丈夫之作吗？只不过一般地说，他不习惯在词中这样写罢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周邦彦用文学形式反映了当时国内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这就是《汴都赋》对王安石新政的赞颂。

熙宁、元丰年间由宋神宗、王安石发起的变法运动，虽然只是封建政权内部的一场改革，但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狼狈局面，在历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性。新法实行的前期，曾收到一定的好效果，使国家一度出现了蒸蒸日上的新气象。但是，由于朝野保守派顽固势力的拼命反对和抵制，同时也由于王安石本人失于考察，用人不当，新法得不到顺利推行。熙宁九年初冬，王安石被迫再次罢相，退居金陵蒋山以后，虽然新法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实施，但变法派的处境已经很困难，保守派的捣乱与攻击有增无已。身为一名普通太学生的周邦彦对时局一直在观察、在思考。他真心诚意地同情和支持熙宁、元丰新政，由衷地赞赏新法的成果。他年少气锐，身上还没有沾染当时士大夫中那种多有的明哲保身的世故气习。他认为：“神宗皇帝盛德大业卓高古初，积害悉平，百废再举；朝廷郊庙，罔不崇饰；仓廩府库，罔不充牣；经术学校，罔不兴作；礼乐制度，罔不厘正；攘狄斥地，罔不流行；理财禁非，动协成算”，而“未闻承学之臣有所歌咏，于今无传，视古为愧”，不甘心在太学“徒费学廩，无益治世万分之一”（《重进〈汴都赋〉表》），于是他毅然提起笔来歌颂新法。这样，一篇煌煌近